

古今“三苗”源流新探

——苗族三大支系迁徙史歌的比较研究

王治新

关于远古三苗是否今之苗族的先民，自来论者不少。但多以旧文献的简略记载为依据，从文献到文献，众说纷纭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，或为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结论。近年来，探索苗族族源而主三苗说的，也不乏人。其中有的论者，除进一步分析旧文献外，更证以考古、语言、民俗等新资料，因而颇多创获，引人注目。看来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新资料，跳出单纯依赖旧文献的圈子，这是文字记载阙略情况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提倡的方向。说是必由之路，也不为过。

本文即打算以现有苗族民间文学资料为主，参以其他资料，对三苗问题作一次新的探索。

一、古三苗与“今三苗”

三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古老的名称。按《尚书》《史记》和《其他先秦典籍》的记载，这个名称出现在尧舜禹的时代，距离现在已经是四千年左右的事了。三苗到底是一个国家（诸侯），还是一个民族（部族、部落），或者不过是个首领——酋长？（因与共工、驩兜和鲧并列），三苗是三个

部分合成的，还是一个笼统的称呼？甚至三苗是否存在过，后来又到哪里去了？等等。这些都是必须回答而又很难准确回答的老问题。由于内容广泛，又牵涉到旧文献的缘故，古三苗的问题稍后再来讨论。这里且说何谓“今三苗”？

苗族之为苗族，是今天中国的现实，不仅数百万苗族人民一向自己承认，而且为全世界所公认。可是，“苗”的前面加个三字再加个今字，成为“今三苗”那就是个全新的提法了。这样提法说得通吗？是否故作惊人之笔呢？

诚然，苗族居地非常分散，两湖两广及黔滇川等七省区，乃至东南亚，都有他们的踪迹。但由于民族意识及其内聚力特强的缘故，他们从来都自认为是一个民族。全国解放以来，国内消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，增加了交流的机会，苗族和兄弟民族之间，苗族内部众多支系之间，更是空前团结，亲如一家。然而，由于至今尚未十分明了的原因，现代苗族内部存在着差别甚大的三大支系，却是事实。承认这个现实，积极挖掘和发现新的资料，对之作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，则无论从社会历史、学术文化的角度来说，或从团结奋斗、共同发展的角度来说，都是当务之急，是完全必要的。这里所说苗族三大支系，也就是泛指以三大方言为区分的三大支苗族。五十年代以来，国家为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创造文字时，通过全面深入的实地调查，明确了苗族语言大致分为中、东、西三大方言。中部方言以黔东南、黔南为主，延及黔西南、桂东北、湘西南、海南岛等地；东部方言包括湘西和黔东南、川东南、鄂西南；西部方言包括贵阳迤西至滇黔川边，以及滇东、滇南直到东南亚等广大地区。

苗语各大方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基本相同，是同一种语

言无疑。但差别却也不小。各大方言区的人若经过互相学习，很难通话。例如苗语中部方言与西部方言的差异，甚至比苗语中部方言与同语族的荔波县瑶族语言的差异还要大。和语言的差异相适应，各大方言区的风俗习惯、服饰、文艺等等，也各有特色。就以各大方言区民间文学中的古史歌来说，差异也很可观：从神话中的神系到迁徙史歌中的迁徙路线，都是自成体系，截然不同的。这种情况恰好表明，“今三苗”的提法有着内在的充分根据，并不是为了攀附古三苗才生造出来的。至于古今三苗之间是否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大而复杂的老问题，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；那么就让我们一步步、一层层地来加以比较、分析、研究和论证吧。

二、文献史上关于“苗”的争论

主张古之三苗即今日苗族先民的，早年当以清代王鸣盛为代表。他的《尚书后案·吕刑篇》有云：“三苗，九黎之后，盖黎与苗，南蛮之名，今日犹然。”持反对论者，以章太炎为代表。章氏在其《菴书》中，当初也主张前说，后来忽然改弦更张，对己说唱反调。他的《排满平议》一文有云：“尚考苗种得名，其说各异。大江以南，陪属猥猥之族，自周迄唐，通谓之蛮，别名则或言僚，言俚，言陆梁，未有谓之苗者。称苗者自宋始，明非耆老旧传，有此旧语，乃学者逆据《尚书》三苗之文以相傅丽耳。汉时诸蛮无苗名，说《尚书》者固不以三苗为荆蛮之族，《虞书》‘窜三苗于三危’马季长曰：‘三苗，国名也，缙云氏之后为诸

侯，盖饔饔也。’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高诱注曰：‘三苗盖帝鸿氏之裔子浑敦，少昊氏之裔子穷奇，缙云氏之裔子饔饔三族之苗裔，故谓之三苗。”此则先汉诸师说三苗者皆谓是神灵苗裔，与今时苗种不涉。”继章氏之后，朱希祖也力主此说。

据此及其他类似说法，近人凌纯声、芮逸夫两氏更竭力主张：“三苗为国名，非种族之名，更非今日之苗，今日之苗，乃古之髦。”因髦、𡩊、茅音义并同，音变则为苗。①云云。

考“苗”的名称，始见于《尚书·益稷》：“苗顽弗即工。”《书·吕刑》也有“齔寡有辞于苗，……降咎于苗”的记载。此外尚有三苗、有苗、苗民诸名称，也多散见于先秦典籍中。其中“三苗”见于《书·舜典》：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……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，幽明庶绩咸熙，分北三苗……”

又，《战国策·魏策》：“吴起对曰：河山之险，信不足保也；霸王之业，不从也。昔者三苗之居，左彭蠡之波，右洞庭之水，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，恃此险也，不政不善，而禹放逐之。”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三苗在江淮（汇）荆州数为乱，于是舜归而言于帝，请流共工于幽陵，以变北狄；放驩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；迁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；殛鲧于羽山，以变东夷；四罪而天下咸服。”

“有苗”见于《书·皋陶谟》：“能哲而惠，何忧乎驩兜，何迁乎有苗，何畏乎巧言、令色、孔壬。”又，《墨子》引《禹誓》：“兹兹有苗，用天之罚，若予既率尔群，

对诸群，以征有苗。”

“苗民”见于《书·吕刑》：“苗民弗用灵，……遏绝苗民……繇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，……苗民无辞于罚。”又，《大禹谟》：“三旬，苗民递命。……帝乃诞敷文德，舞于羽于两阶。七旬，有苗格。”

据上引各条，足见苗与三苗、有苗、苗民是异名而同实，同在一个“苗”字上。这些名称都始见于同一古籍《尚书》，虽然各名称出现的时间各有先后，但相距不是太远，其诸名称间的关系，脉络分明。其中《舜典》说“窜三苗于三危”，《皋陶谟》说“何迁乎有苗”，迁者窜也，所指固为同一事实；两名虽略有岐异（前面的定语不同）然皆谓之苗则一，故有苗即三苗明甚。《大禹谟》始言“苗民递命”，继云“七旬有苗格”，则有苗即苗民尤为明显。根据逻辑推理：A=B，B=C，则A=C；亦即A=B=C。也就是说：三苗等于有苗，有苗等于苗民，则三苗等于苗民；亦即三苗等于有苗等于苗民。三而一，殆无疑义。今人袁珂先生亦主此说，他在其《山海经校注》中“三苗国”条下有云：“实则三苗即有苗，亦即苗民。”对于高诱原注：“三苗盖谓帝鸿氏”等“三族之苗裔”云云，则驳之曰：“盖谓云者，乃臆想之辞，难于凭信。”这样说法我们认为是极有见地的，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与三苗同时还有驩兜，早于三苗还有蚩尤，那就更加复杂和邈远了。因而论者有主张蚩尤为苗族始祖，而驩兜族同为苗族先民的，也有持怀疑论，说古文献不足证而又别无其他确证，不能肯定的。本文于此，姑置勿论。

三、苗族古歌中的三大“迁徙史歌”

这里所说苗族古歌是泛称，包括苗族各支系的一切古歌在内。其中现所掌握最著名的几部是：（1）198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得奖作品《苗族古歌》，实为苗语中部方言区黔东南的苗族史诗，亦称“苗族古史歌”。（2）东部方言区的湘西和黔东南、川东南，另有他们自成体系的史诗，统称《侗巴侗玛》，亦译《苗族古老话》②、（3）苗族西部方言区的滇黔边境彝良、威宁一带，也有他们自成体系的史诗，可称为《西部苗族古歌》③。这三部苗族古史歌各有特色，在各自所属大方言区中具有代表性。惟篇幅浩大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非本文所能胜任；假以时日，笔者当另有著述。本文只打算以三大古歌中有关民族迁徙的部分为主，先作一粗略对比，虽不过金豹之一斑，或可稍稍印证三苗之说不独由来古远，抑且脉络分明，至今赫然尚存，决非如马融、章太炎等所谓三苗不过是古帝王之裔子浑敦、穷奇、饕餮“三族之苗裔”；而宋以来称今之苗族为苗，不过是“学者逆据《尚书》三苗之文以傅丽耳”。——决不是这样的！

上述苗族三大古歌，大抵包括神话和传说两部分。其中迁徙歌部分，属于古史传说，其历史性、可信性都较为显著，苗族人民世代代本来就是把它们当作祖先事迹——民族历史来传诵的。

关于迁徙史歌，在中支黔东南《苗族古歌》里，题名《跋山涉水》④（nangx eb jit biI，直译为沿河跋山），在东支湘西《侗巴侗玛》和《古老话》里，分别题为《民族大迁徙》和《部族变迁》⑤。在滇黔边的《西部苗族古歌》里，

题为《迁徙诗歌》⑥。另有《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古史传说》⑦一文，也是根据迁徙史歌写作的，可作为滇黔边《迁徙诗歌》的补充。在广西融水自治县的《苗族神话传说》中，也有《跋山涉水、分支分族歌》⑧，可作为中支黔东南《跋山涉水歌》的补充。这些迁徙史歌的篇幅都不少，即使仅仅摘录要点，也相当可观；而为着本文论证的需要，至少在迁徙路线方面又不能不大略窥其全貌。因而我们只得将其摘要附于文末，以便既可立即进入论证，又可随时检阅对照。

四、三大迁徙的比较

从三大迁徙史歌的梗概看来，它们之间有同有异。且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，情况相当复杂。同处是直接间接都受到环境或敌人的压迫，生活极端困苦，甚至无法生存下去，这才历尽艰辛，千里迢迢地相率迁徙的。其次，既然是被迫，因而总是从大江大湖大平原地带；一次又一次往边远贫瘠山区转移。第三，不是零星散漫的短时间短距离搬家搬场，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长期长途跋涉，举族集体大转移，甚至可说是一支支严整的战斗队伍。第四，频繁的迁徙，苦难的历程，不管受过多少折磨，损失多么惨重，各大支系都能一次又一次地白手起家，重建乐园，极少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。苗族人民几千年来这种坚韧不拔、宁死不屈和乐观主义的民族精神，确实极可宝贵，值得称道。

从异处讲，也不算少。三大迁徙的相异之处，一是迁徙的原因不尽相同；二是迁徙路线截然不同；三是迁徙时间有先有后，有长有短；四是各支系的发展程度不同，经历不

同，结局不同。

（1）迁徙原因不尽相同

从迁徙原因说，本来都是为了摆脱困境，寻找出路，但A、就中路黔东南支系而言，其所受压力主要为自然压力，即土地、粮食和人口的压力。土地粮食压力诚然包含人为因素，史歌虽未述及，可推而知之。例如平原沃土渐为他族强者所蚕食占有，这种占有又非武力强占而是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来和平实现的，于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落后的苗族中支这一方，于不知不觉中便已败北而退出原地，通观这一支系的大迁徙，虽为时不短（一说十三年，一说十年），历程也甚遥远艰巨，但若仅就这次迁徙的具体过程而言，自始至终确实没有一点血腥气和火药味；虽也使用长刀弓箭，并非用于克敌致胜，而是用于向大自然开路 and 索取给养。因而这一迁徙，不妨说乃是和平迁徙。正因为是和平迁徙，故元气未丧，虽然历尽沧桑，至今黔东南支系仍为居住最集中，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保存得较完整的一支。（这次迁徙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，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过战争乃至瘟疫的洗礼，但迁徙史歌中既未涉及，我们也就只好随便臆测，除非今后有新的资料发现，那时再说。）

B、东路湘西支最初也近乎和平迁徙。尽管也有“受人欺侮”“出了魔鬼”之类语言，但毕竟未见大规模的战争。从第四次播迁起，异族统治者（皇帝家）一次比一次凶猛的武装镇压，便成了迁徙的主要原因；而且压力一次比一次大，反抗一次比一次烈，损失一次比一次惨重，一次比一次更远地往深山穷谷迁走。

C、西路滇黔川边一支，迁徙的唯一原因就是战争。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异民族武装掠夺和侵占土地，一开始就同以沙召觉地望为代表的异族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于是一次次抵抗，一次次战败，一次次逃迁。直到最后落脚于滇黔川边一带时，元气大丧，已溃不成军，不得不依附于彝族大奴隶主为奴，才得以逃脱异族统治者的追击而幸存下来。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：在彝族奴隶主的卵翼下，他们一直“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”⑨，直到解放。这一部组诗式的《迁徙诗歌》，自始至终是一部悲壮激烈的抗战史和英雄史诗。

（2）迁徙路线截然不同

从迁徙路线来看，三大支系各各不同，差别甚大；特别是西路，比之中东两路，更是大不一样，毫无共同之处。西支除仅有的一次是短时东迁外，其余十来次迁徙全是由北往南，穿越过一个个平原平坝，横渡过一条条大江大河南下；不象中东两路，主要是由东而西，一个劲地“沿河沿水而上，翻山越岭而行。”

A、先看中路黔东南支。这一路，根据史歌反映，可以设想为以洞庭湖边平原地带为起点，从“沅湘之间”遵陆路上行。沅湘之间还有一条较小的资水，沅水东南岸与资水之间是雪峰山脉。史歌前段所说翻山越岭，就是这雪峰山脉地带。当他们抵达“金河银河稻花河”三条江，即今巫水（古雄溪）、潯水（古潯溪）与沅江上游清水江汇合处时，曾有过犹豫和抉择，最后才选定稻花河；此所谓稻花河应即巫水，乃循巫水而上。（另一资料说是四条江，除金河银河稻

花河外，还有桐油河，那么这第四条河就只能是与巫水几乎平行而稍小于巫水的渠水，在紧挨贵州的托口地方入沅）循巫水上至窄口滩，舟楫难通，才舍舟登陆。请注意！从这里起，又是走的陆路了，就是顺着“南岭走廊”中越城岭的北麓往西，经通道黎平并越过苗岭东头比较平缓的分水岭，以达岭南的方仙。这便是这次大迁徙的终点，黔东南州榕江县城郊车江大坝一带。

这里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：首先，中支迁徙的起点应在太湖区域，不是海滨。史歌整理本诚然是说“居住在东方，靠近海边边，水天紧相连，眼望不到边。”不过，据笔者所知，并曾与一些苗族同志交换意见，都承认传统的苗语中部方言（至少在二、三十年前记录的古歌资料里）并没有等同于“海”和“东”两个概念的词儿，他们表示东方，原是说的“下游”，也可意译为“下河、下江”，只因常言无水不朝东，一般便干脆译为东方了。既然是“水天紧相连，眼望不到边，”又位于下游或日出处，不是“东方的海洋，”又是什么呢？其实平心而论，还不如按原文直译为下游或日出处“水天相连的地方”，既符合实际，又形象生动。我们认为，这种描述固然可以理解为海，也无需否认苗族先民们一部分在或一时期曾经生息于海滨；这种可能性还很大。况且苗族古歌一般喜欢从“起根发脚”唱起，故不能排斥在此之前苗族中支业经多次迁徙，早从海边辗转来到了湖边。但无论如何，就这篇史歌的特定内容而言，倘若起点真是滨海平原，则从海滨到西南山区，遵水路须一直溯大江越太湖而上（象东支那样），遵陆路除翻山越岭而外，至少还须横渡赣江、湘江、资水等大河，才能到达沅江中游河谷，漫漫长途

数千里之遥，史歌中竟无任何可与这一线的地理环境相印证的简单描述，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。故不如直认这次（1）迁徙是从太湖沿岸出发，反倒同“左洞庭，右彭蠡”的史载方位暗合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长江中游的这两大湖泊，同样是“眼望不到边，”对于西南山区来说，也正处于众水汇集的“下游”或“日出处”。从这里出发往西迁徙，无论就史歌的内容说，就地理形势说，都顺理成章，符合实际得多了。从洞庭湖畔“沅湘之间”循陆路上迁，确实没有多远就进入山岳丘陵地带，正是“走走又走走，爬上高山头，回头看家乡，留在白云后”的景象，恰与史诗开头部分的这种描述若合符契。

第二，中支迁徙路线有陆有水，艰险曲折，远非如一般不加深考的说法那样，简单地误认为一直是“循沅水而上”。否！据史歌反映，本支在进入沅江中游河谷，遇到三条江和大渡口以前，一直是顺山顺谷徒步旅行，不象东路湘西支那样，自始即“划船打马”，水陆并进。考沅湘之间，自古即为“苗蛮之地”。宋时朱熹在其《楚辞集注》中，承汉代王逸《章句》旧说，谓“昔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。荆蛮陋俗，词既鄙俚。……”云云，指出沅湘之间为荆蛮故地，这是说的战国屈原时代。及至朱熹自己作潭州地方官时，还在岳麓山建有“谕苗台”⑩；潭州包括长沙附近湘水两岸的六七个县，足证沅湘之间至少直至宋代朱熹之时，仍为苗蛮之地。然则中部方言支系原住沅湘之间滨湖地带，其后逐步从陆路西迁，基本上是从沅水东南岸雪峰山脉这条荒僻的走廊上行，这是完全合理的。因为从这一带上迁，没有大河阻隔，最宜陆

行，与史歌前段翻过一山又一山的描述正相吻合。

然而自沅湘之间滨湖地带西迁贵州，捷经实为溯沅江而上，何以不遵水路而却陆行呢？此有二因：一为沅江下游所经武陵地区，早为苗族本族东支所据；或此下游咽喉地带早为异族统治阶级所控制。二为本中支造船航行技术落后，远不及东支发达。但看东支自始即水陆并进，并有大板船，中支虽说本来“住在海（湖）边边，”然而史歌前段毫无泛舟江湖，航行海上的描写，直到进入沅江中上游一条支流的山间峡谷以后，无路可走，才开始来学造船，且其形制显然为原始独木舟可证①。

第三、为何选中稻花河，稻花河究何所指？原来沅江东南岸除中游有支流溆水较大外，直至紧邻贵州的湘西洪江地方，才有一条大支流巫水来汇。巫水即雄溪，为古五溪之一。洪江上游不远，另有溁水自西北来汇，亦古五溪之一，其上游贵州境内今称溁阳河。正西为自贵州东下的清水江，即横贯黔东南自治州的沅江正源。此三水在洪江附近汇合后，乃称沅江。

按自湘西入黔，西溯清水江或溁阳河而上，最为便捷。此二水应即史歌所称金河银河。但为什么摆着捷经不走？表面的理由是：“金子淘得尽，银子挖得光；”实际的原因是：湘黔边境一线开发较早，原为古黔中郡和武陵郡辖境。这里北起玉屏、晃县，中经天柱、锦屏，南迄黎平、剑河之间，包括清水江、溁阳河二水在这一带所经沿岸，早为北部侗族居地，入黔捷径为之堵塞，故后至的苗族移民既然是和平迁徙，又是举族大规模转移而非零星渗入，自然不能强行通过，如庄蹻征滇可以长驱直入那样，且自秦取黔中，汉灭

夜郎旦、设牂牁郡以来，潯阳河清水江之间湘黔边境一带，早已成为经略西南的咽喉要地，必有武装镇守，正是苗族迁客避之惟恐不及的。于是不得不舍近求远，折向没有阻力或阻力较小的南方，“沿着稻花河，进入米粮仓。”故稻花河应指巫水，而决非清水江，尤非潯阳河。巫水流域的城步、绥宁、会同等县，至今仍有不少苗族居住，且语言多属中部方言可证。又据中支旁系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《跋山涉水，分支分族歌》反映，除大方向及其路线与中支完全吻合外，还说这次迁徙所经之处，只要是个好地方，都曾暂住一段时间，并留下一个小分支在那里安家，这更符合大迁徙的实际情况。过城步后，即进入“南岭走廊”中五岭之一越城岭的北麓。“来到窄口滩，划船上滩难，丢船快上山。”此后又经历过许多险阻，一直陆行，以达终点方仙，即今黔东南州榕江县城郊车江大坝一带。

第四，榕江县城所在的方仙大坝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的南麓，都柳江流经城下，木船可直通广西。然则苗族迁客之到达终点方仙，何以不由水道，却从陆路而来呢？原来巫水所从出的五岭山脉，西接贵州苗岭，均属南岭山系，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，深山大壑，荒无人烟，是对苗族移民阻力最小、最有吸引力的一条通路，也是自古以来天然的民族移殖大走廊，除苗族外，瑶族及百越的某些支系，也曾循此往西或往东迁移。苗族迁徙大军在巫水上游舍舟登陆（上山）以后，便顺着五岭北麓穿越通道、黎平一带的荒僻山区，直达终点方仙，因而用不着迂回至岭南广西境内，再溯都柳江而上。何况现住都柳江下游的广西融水县这支属于中支旁系的苗族，当年原也是随大流从陆路先到方仙，在方

仙“分支分族”后才南下广西的。“五岭逶迤腾细浪”，五十年前工农红军长征，不也正是取道这条“南岭走廊”，沿五岭山脉的北麓，经通道黎平而进入贵州的么？这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，这一线虽非坦途，但地广人稀，统治阶级鞭长莫及，人民的队伍在这里有充分的回旋余地，自古皆然，实为最主要的原因。

第五，自明清两代史志对贵州苗疆有较详较具体的记载以来，黔东南的清水江雷公山地区一直是苗族聚居的中心地带。所谓“九股生苗巢穴”的九股河，就发源于雷公山的西北麓，流经雷山县城关，凯里市挂丁，至台江县巴拉河入清水江。可是史歌说得明白，清水江两岸的苗族并不是溯沅江和清水江一直上来的，乃是先到岭南方仙落脚，继而在方仙剑河间苗岭山脊的松党坳吃牯脏祭祖和分支分族后，除一支留方仙外，其余四大支都是翻过雷公山东西两侧的大分水岭，才进入另一个米粮仓——清水江中游两岸腹心地带的；他们“一支住方尼（今台江），一支住者雄（今雷山），一支住希陇（今黄平），一支住申整（今凯里炉山）。”凯里舟溪一带传说原是木佬人居住地，现在木佬人比苗族少得多，但舟溪一带至今每逢插秧季节，须等木佬先“开秧门”，然后苗族才能接着普遍插秧，以示“先来后到”及对土著友好兄弟民族的敬意。苗族进入清水江流域不是溯沅江、清水江直上，并且比木佬、仡佬、土家都晚，代代相传的古史歌没有说谎，风俗习惯也自有其生活依据，历史的真实如此，不由我们不相信！

B、东路湘西支的迁徙，一共七次；头一次是沿雾穷 稀雾穷萨大河顺流而下，以达厚吾厚西，然后第二次又自厚吾

厚西返航。按本篇（《民族大迁徙》）译注：雾穷稀雾穷萨是“象灰一般雾一样的大河，传说那是黄河”。而湘西迁徙史歌的另一版本《部族变迁》对雾穷稀雾穷萨则音译为务昌锡务昌啥，译注直指其为今武昌一带；对厚吾则音译为“勾吴”，译注直指其为长江下游古吴国地；然则此大河应为长江。此两说虽有矛盾，无非是想说明，苗族远古曾经居住在黄河、长江沿岸，或滨海平原地带。这些说法都有一定根据和可能。虽然结合史歌的具体内容，我们倾向于长江说，但这里勿庸深论。问题在于第二次从厚吾厚西返航后，并未回到老家，却是中途别觅新路，开始了第三次迁徙；那么这段历程又在何处呢？观其描述“上到峭壁悬岩的腊哈腊熊，马不通程，船不通路”，是“向神人借来了神凿神斧，打通水路陆路，又才沿河沿水而走，翻山越岭而行”，以达占楚占菩。显然这一路上已是山区河谷景色。译注说，腊哈腊熊为苗语古地名，位置约在临沅（今常德）与沅陵之间。又说占楚占菩为荒原阔野之意。此二说如果可靠，那么经过一二三次长途播迁后，第一个落脚定居的乐土占楚占菩，当即沅江下游常德附近的一片沃野。

占楚占菩遭大破坏后，便放弃了它而“拨船”转移，开始第四次迁徙。这次征程是“从洞务洞觉上来，从洞焦洞湾上来，跨江过湖上来”（译注说是指洞庭湖一带）以达梅花堤梅花峒。梅花堤梅花峒是这样一个地方：一则原本“荒无人烟”，再则虽经惨淡经营，有所发展，但“有水可以捞虾捞鱼，无山不能猎兽擒虎”，足见仍在濒临河湖地带，当为澧水下游入湖处附近的荒草滩。由于自然条件较差，故又主动转移。

从梅花堤梅花峒转移，属于第五次大迁徙，这次征程是“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”、“沿着长长的河水上走，顺着高高的大山上迁”，是“从薺堤薺仨上来，从澧州澧峴上来”，以达沅澧二水间，今湘西自治州大庸县境的崇山。这里已经有可识别的澧州澧峴和崇山，则第五次是溯澧水西迁无疑了。

第六次迁徙以“下山”始，即撤离崇山根据地：“骑驴骑马下山，飘云飘雾下山”，然后“又从大路小路上移，又从大河小河上迁。”这个大河小河应属沅水中游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迁入沅江流域腹地，并不是从沅江口一直进来的，在沅江下游占楚占蕃受阻，然后转向澧水入崇山的。下山以后才在中游进入沅水主流。并相继散布于沅水两岸的各大支流，即均属“五溪”的酉溪、武溪、辰溪等等。

第七次迁徙则是继续溯沅水及此三溪往西纵深发展，大部定居于今湘西自治州腹地各县，一部分直达黔东南、川东南边区。至此，东路大迁徙即告结束，基本定局。

一说史称“放瓏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”，即指这里所说的崇山，而瓏兜亦即苗族本(东)支始祖。此说虽自有所据，但异说亦多，且与史歌所述大迁徙无涉，姑置勿论。

C、西支迁徙路线所经之地，其平原、山地、河流、湖泊、城堡、居留地、战场等，皆有苗语名称，惟除最初之浑水河可视为黄河上游，中途的斗南—莫江（一译图南玉末河），可视为金沙江，其最终落脚点可与今滇黔川边一带地名核对外，大都无法直指其为何所。然而细加寻绎，其大方向大脉络却又相当清楚。第一，根据史歌反映，本支远古原曾生息于“冰天雪地”，后因不宜人居和饥荒，故先往南继